

創傷、“文革”記憶及疾病修辭： 論林斤瀾《十年十癮·五分》及 余華《一九八六年》中的瘋癲書寫^{*}

梁淑雯

提 要

本文以兩篇作品林斤瀾《十年十癮·五分》及余華《一九八六年》為例，探討八十年代中期大陸當代小說是如何以“瘋癲”敘述“文革”的問題。本文首先從瘋癲“症狀”的角度切入，援引拉康等學者的精神分析理論，探討“症狀”作為“文革”創傷記憶的修辭方法，當中強調不同症狀有自身修辭特色。林斤瀾《十年十癮》以“五”符號象徵“文革”創傷記憶，而余華《一九八六年》則以幻覺將“文革”時空展現讀者眼前。接著從“症狀”來探問“病因”，兩篇小說中的主人公發病源自“文革”創傷經歷，症狀便成為“文革”病態社會對個人身體的烙印，探討作家是如何借個人的“不正常”症狀，來揭示及控訴“文革”政治壓抑年代的瘋狂。最後，應用卡露絲創傷理論，分析這兩篇小說中的疾病修辭效果——症狀延緩性，從而發掘這種以疾病修辭方式來敘述“文革”的意義。

關鍵詞：林斤瀾《十年十癮》 余華《一九八六年》 瘋癲 疾病修辭 “文革”
創傷記憶

* 感謝匿名評審專家的寶貴意見。

一、前 言

在中國當代文學八十年代中期以降,有一批小說以“瘋癲”角度來書寫“文革”記憶,如林斤瀾《十年十癥》、余華《一九八六年》、格非《傻瓜的詩篇》、韓少功《鞋癖》等等。¹ 這批小說描寫主人公經歷“文革”迫害,或是因面對家人朋友受迫害的經過後,壓抑的心理創傷引發各種瘋癲症狀,例如幻覺、恐懼、戀物等等。這些作家通過疾病角度去挖掘“文革”創傷記憶的深度,當中特別關注人們經歷“文革”十年浩劫後的心理創傷經驗。這種處理“文革”記憶的方式,與“傷痕文學”如盧新華《傷痕》、劉心武《班主任》、陳國凱《我應該怎麼辦》、從維熙《大牆下的紅玉蘭》等作品有所不同。楊小濱曾指出余華的《一九八六年》有別於“傷痕文學”以理性敘事主體來寫“文革”,而是以一個受到歷史創傷的非理性敘事主體來寫“文革”,把“傷痕文學”所著重呈現的“客觀”“文革”“現實”寫成一個“主觀”心理故事。² 換言之,這批小說填補了“傷痕文學”中的“傷痕”所欠缺的心理創傷維度,正如林斤瀾在《十年十癥》序言中指將“憶”變成“癥”,³ “文革”記憶變成瘋癲病歷,意味著按照疾病結構來敘述“文革”。而這批小說通過“瘋癲病歷”這個視點,聚焦於“文革”的心理創傷經驗,試圖講述一個與“傷痕文學”不同的“文革”故事。

“傷痕文學”,以感傷性和悲劇性的基調來書寫“文革”災難對人民所帶來的身心傷害,作家以這些文學作品來暴露及批判“文革”時期的政治黑暗,故亦有稱之為“暴露文學”。⁴ 這種暴露歷史傷痕的“文革”敘述,剛好配合了當時政治意

-
- 1 這批小說主要是以“瘋癲”來書寫“文革”記憶。除此之外,還有以“瘋癲”講述當代中國社會中的荒誕現象的小說作品。這些小說多數以醫院作為社會隱喻,在八十年代有徐小斌《對一個精神病患的調查》、余華《河邊的錯誤》,九十年代有遲子建《瘋人院的小磨盤》,直至千禧年還有蘇童《黃雀記》等等。這類型作品並不是本文討論範圍。
 - 2 楊小濱著,愚人譯:《中國後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創傷與反諷》(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頁60。
 - 3 林斤瀾:《說癥(前言)》,《十年十癥》(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6年),頁1。
 - 4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56—257。

識形態的需求。⁵ 戴錦華指出，爲了配合八十年代“啓蒙”的定位，以及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作出徹底否定論，“將‘文革’時代定位爲一個中國社會‘正常肌體’上似可徹底剔除的‘癌變’，從而維護了政權、體制在話語層面的完整和延續”。⁶ 爲了修復這種意識形態斷裂的縫隙，戴氏認爲“傷痕文學”的暴露和批判功能，擔當了清算“文革”這個重要角色，配合了這種意識形態的發展。而有些學者認爲“傷痕文學”不僅順應了政治潮流，而且更配合社會大眾的心理需要，如盧新華的《傷痕》便是呼應了當時成千上萬家庭所面對的冤案“平反”風潮。⁷ 這樣精闢地道出這種意識形態的成功，某程度上取決於“傷痕文學”的社會功能。

許子東在《新時期的三種文學》中論及“傷痕文學”作爲社會文學的意義。文中指“社會文學”功能有二：一是作家（及讀者）明確地理解到文學基本作用在於對社會政治產生影響力；二是作家有意借文學改造社會，從而透過讀者的閱讀反應來推動社會改革。

比如“傷痕文學”，種種控訴、哭泣、憤懣、呻吟一方面從理性上加重人們的傷痛：“瞧，你的傷痕連著國家、民族的災難！”另一方面又從心理上減輕了人們的傷痛；“你看，受苦受傷的也不只是你一個，人家也在流淚淌

5 陳思和從官場上的派系鬥爭指出“傷痕文學”的作用，從另一角度說明了“傷痕文學”的政治功能。陳氏指“以‘傷痕文學’爲發端的‘文革’後文學，在開始階段裏從時間上極其巧合地配合了政治上改革派對‘凡是派’的鬥爭。所謂‘凡是派’的主張是對‘文化大革命’及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的維護，是在理論上繼續捍衛新的極左統治。‘傷痕文學’以顯明的立場表達了對‘文革’的徹底否定及對相關現實問題的揭露和批判，這種真摯而深切的現實情感在廣大群眾中獲得響應，成爲改革派否定‘凡是派’的威力巨大的武器”。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90。

6 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42—43。本文認同戴錦華所言傷痕文學對文革敘述“維護了政權、體制在話語層面的完整和延續”，特別是傷痕文學如何通過敘述性重構“文革”來呼應官方徹底剔除“文革”論，從而體現了這種敘述所發揮的意識形態功能。

7 張法：《傷痕文學：興起、演進、解構及其意義》，《江漢論壇》，1998年第9期，頁59。程光燁還指出“傷痕文學”的文學資源仍未脫離“十七年文學”的模式，而“十七年文學”對“傷痕文學”的影響，更體現在作家反射式地將文學與政治掛鉤身上。程光燁：《“傷痕文學”的歷史局限性》，《文藝研究》，2005年第1期，頁19—20。

血……”前者正面強化了人們憎恨“洗劫”的社會姿態，後者又從後面幫助人們恢復走向明天所必須的心理力量。顯然，這種群體歸屬感及其動態心理效應，是“傷痕文學”能以牢騷、呻吟等宣洩形式達到“解放思想”的理性啓蒙效果的一個關鍵。⁸

許子東在討論“文革”小說的敘事模式時，指出某些“傷痕文學”作品的敘事結構與讀者閱讀心理的關係，例如盧新華《傷痕》、陳國凱《我應該怎麼辦》、從維熙《大牆下的紅玉蘭》、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古華《芙蓉鎮》等等。這些作品普遍將“文革”講述成“少數人迫害多數人”的災難故事，當中隱含著“因禍得福”的意義結構——受害者在災難之後又重回正軌，或者獲得更幸福的生活。有些故事是因少數悲劇英雄的禍害，而成就了其他人幸福，例如從維熙《大牆下的紅玉蘭》，有些故事是因“文革”禍害而獲得更大幸福，例如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許氏續指這些小說敘述時間大多與故事時間相同，線性情節敘述有助落實“因禍得福”的意義結構，將大眾在“文革”前後的苦難按線性時序排列來開展，“文革”傷痛在線性時序框架之下獲得解脫。這種為讀者大眾提供情緒渲洩渠道的控訴文學，實際上是以“忘卻‘文革’”的方式來書寫“文革”。⁹

為了“治愈”而書寫，“傷痕文學”對“文革”創傷記憶的發掘，明顯地趨於政治化。創傷暴露是為政治社會的需要，創傷復原也是政治社會的需要，浩劫過去“四人幫”倒臺，受苦受難過後，故事大多是大團圓結局。¹⁰《傷痕》引起讀者最大共鳴的是，主人公王曉華因政治原因與母親決裂，但更為悲慘的是母親於“文革”獲得平反後不久便死去。王曉華錯過了探望母親的時刻，卻在舊日情人小蘇身上找回慰藉，小蘇代替了曉華探望母親，還把母親日記本留給了曉

8 許子東：《新時期的三種文學》，《文學評論》，1987年第2期，頁64。

9 在研究五十篇(部)“文革”小說中，差不多有一半的作品都具有“忘卻‘文革’”的傾向。而許氏從敘事模式的角度，指出余華《一九八六年》及林斤瀾《十年十癮》之中的《氤氳》卻是對上文所提及的“災難故事”式的“文革”敘述的反抗。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頁270—271。

10 張法：《傷痕文學：興起、演進、解構及其意義》，《江漢論壇》，1998年第9期，頁58。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頁209—212。

華看，愛情力量抹平了內心創傷，結局是曉華拉著小蘇堅定地走向光明未來。¹¹ 類同情節又出現在《我應該怎麼辦？》的故事之中，主人公薛子君的丈夫被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後畏罪自殺，而被視為“特嫌分子”的姑媽則死在“牛欄”，主人公卻獲第二任丈夫亦民安慰，在這裏主人公創傷經驗變相成為愛情故事邂逅情節的大背景。而且這個愛情故事背後，其實有更大的政治邏輯，亦民參加悼念周總理的活動後，薛子君又成了罪犯家屬，最後結局是“四人幫”倒台挽救了他們。在此“文革”創傷和家庭破裂也可隨著政局轉變而復原。¹² 而相同的政治邏輯，在從維熙《大牆下的紅玉蘭》主人公葛翎身上重複。葛翎舊日是省勞改處處長，現今卻成了階下囚，最後葛翎為了悼念周恩來爬上大牆上獻花，卻中了害他的馬玉璘、章龍喜圈套而血濺大牆。有學者指主人公的生死命運全都與政治歷史有關，到了死亡的一刻，獻花之舉也喻意著對人民的奉獻。¹³ “傷痕文學”在處理創傷經驗時，明顯缺少心理維度的刻劃，而且更偏向“愛情化”和“政治化”，故事當中沒有屬於個人的創傷，只有屬於國家、黨和人民的傷痕。無論是愛情故事還是政治故事，顯然，“文革”創傷記憶被愛情粉飾以及被政治遮蔽，在此“文革”傷痕已淪為當時政治意識形態的符號。

由“傷痕文學”發展而成的暴露反思“文革”的文學潮流，在1979年至1981年達到高峰後，卻逐漸減退。¹⁴ 高峰過後，八十年代中期以來，¹⁵ 有一批小說從

11 盧新華：《傷痕》，谷聲應、陳利民編：《中國新時期文學精品大系》（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年），頁150—161。

12 陳國凱：《我應該怎麼辦？》，《陳國凱小說選》（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頁31—54。

13 李敏：《“傷痕”與“反思”文學中的創傷敘事研究》（山東：山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頁98。

14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頁258。

15 大陸當代文學於八十年代中後期發生重要轉變，文學位置受到經濟改革開放成功的衝擊，失去了作為整合意識形態的絕對效用。陳曉明引王蒙1988年發表《文學：失卻轟動效應之後》，談到大陸經濟改革成功後，人們紛紛將熱情集中在經濟活動身上，而不再是在於國家動蕩以及政治變革的意識形態身上，於是對文學的熱情亦日漸退減。而且，陳氏續說大陸政府長期實行意識形態的統一模式在高峰過後，於八十年代後期已經表現得軟弱無力，政府無意再以意識形態來整合社會的精神面貌，而在經濟發展迅速的趨勢之下，經濟實用主義成為了社會的意識形態實踐。本文認為這種歷史語境為八十年代中期提供某種書寫“文革”空間的可能。陳曉明：《剩餘的想像：九十年代的文學敘事與文化危機》（北京：華藝出版社，1997年），頁14—15。

“不正常”的心理角度重寫“文革”，當中林斤瀾及余華的作品同樣以“1986年”這個“紀念”“文革”時刻為題，來思考“遺忘”“文革”的問題。林斤瀾指“文革”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政策加快了人們遺忘的步伐。如果這是“向前看”，書寫“文革”好像是“向後看”這般不合時宜。林斤瀾在《十年十癮》的前言寫道“人們已經煩厭了，讓它（按：“文革”）一個‘無字碑’放在滔滔歷史上也罷”。¹⁶ 由經濟繁榮發展引申而來的小市民生活，恰巧是余華《一九八六年》中小鎮的寫照。小鎮的居民沐浴在幸福的生活當中，無視“瘋子”的存在，因為“冬天已經過去。春天已經要來了”。¹⁷ 記憶在季節轉換之間泛黃，時間成為記憶的敵人，對抗遺忘彷彿成為兩位作家在八十年代中期重寫“文革”的意義。故此，本文先以林斤瀾《十年十癮·五分》及余華《一九八六年》為分析對象，以期能拋磚引玉，討論在“傷痕文學”熱潮過後的這個時刻，作家如何使“文革”故事由大敘述回歸到個人聲音，並且如何以瘋癲書寫來對抗“文革”記憶的遺忘。

正如前所言，林斤瀾《十年十癮·五分》及余華《一九八六年》是兩篇書寫主人公不正常心理的“文革”故事，記錄著瘋癲症狀不時侵擾主人公，每次侵擾如同重新經歷“文革”時所受的苦難。這個現象與創傷後遺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病理相當吻合。創傷後遺症患者在生活之中經歷極大恐懼或超出預料事件，在他心理上造成了分裂（*split*）或分離（*dissociated*）的現象：因為意識和認知能力機制受到破壞，患者難以面對所受傷害，令患者在意識和認知無法確認是次受害經歷。表面上，患者無法憶起受害經驗，但實際上侵入性創傷記憶（*intrusive traumatic memories*）成為症狀重新返回患者的日常生活之中。¹⁸ 創傷記憶轉化成為症狀，這是由一種表述轉化成為另一種表述的過程。正如拉康（*Jaques Lacan*）指出，症狀結構好比語言結構。¹⁹ 症狀的能指如幻聽、戀物、焦慮或恐懼等發病時的表徵，症狀的所指便是創傷記憶，轉換過後創傷記憶便化妝成為症狀，“文革”記憶進而轉化成為“病因—症狀—病發”的因果

16 林斤瀾：《說癮（前言）》，《十年十癮》，頁1。

17 余華：《一九八六年》，《現實一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頁150。

18 Ruth Leys, *Trauma: A Genea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2.

19 拉康著，褚孝泉譯：《拉康選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頁279。

病症結構關係。如此說來，本文所關注的正是“文革”記憶與病理結構這兩種話語系統之間的轉換關係，探討作家如何借助“瘋癲”來敘述“文革”。

本文以“症狀”作為切入點，援引拉康等學者的精神分析理論，探討症狀作為“文革”創傷記憶的修辭方法，當中特別關注的是，不同症狀是如何透過不同的病症結構來書寫“文革”創傷記憶？接著從“症狀”來探問“病因”，兩篇小說中的主人公患病源自“文革”創傷經歷，症狀便是“文革”病態社會對個人身體的烙印，而作家又是如何借個人的“不正常”來控訴這個政治壓抑年代的“不正常”？最後，本文回到“病發”，從創傷理論而言，症狀是經歷創傷後遺症的延緩性反應，連繫著當下創傷事件發生的時刻，所以症狀是創傷記憶和歷史真相的載體。然而，症狀拒絕被困於過去時空，而其擁有一種悖論時間觀：症狀雖然屬於“過去”，但每次的延緩性返回並不僅僅是“回到過去”，而更多的是通過自身的延緩性來衝擊現在以至未來時空，從而令歷史創傷具有跨越時空的效能。²⁰ 在這兩篇小說中“症狀”以“病發”方式返回，又是怎樣成為對抗遺忘“文革”記憶的方法呢？

二、林斤瀾《五分》與恐懼

林斤瀾的《十年十癥》寫於“文革”十年後的1986年，顧名思義，作者用十篇作品來銘寫十年浩劫的記憶。王斑指作家借“精神分裂式”的碎片記憶來重構這道歷史傷痕，十篇作品如同十篇病歷，每篇記載不同的症狀，如王氏對《十年十癥》的第一篇小說《哆嗦》的分析指出，主人公十年來哆嗦的身體反射作用是與面見毛主席的記憶有關。王氏指出症狀是閱讀林斤瀾《十年十癥》的關鍵，²¹然而，卻未見王氏進一步指出記憶如何轉化成為症狀，以及症狀如何敘述“文革”的“不正常”，這種以症狀來敘述“文革”的方式，正是林斤瀾的《十年十癥》書寫“文革”的特色。《十年十癥》除了寫哆嗦，還寫恐懼，《五分》便是一篇

20 Cathy Caruth,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8—9.

21 王斑：《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香港：牛津出版社，2004年），頁141—144。

恐懼症患者的病歷。林斤瀾在小說中展示“五”鋪天蓋地式的強大威力，“我姐姐”五歲背五言詩，長大後作五言詩，詩作題目又是五個字，最後“文革”行刑前的作品是《獻給法官的五朵玫瑰》，“五”這個象徵符號代表著那個政治壓抑年代的記憶，最後還烙印在“我”的體內，成爲一種症狀。小說敘述者“我”是一位恐“五”症患者，同時又是講述反右運動到“文革”對“我姐姐”迫害的見證者。小說以回憶方式拉開序幕，寫“我姐姐”的老朋友爲她立碑修墓，接著從“我姐姐”五歲生活講起。在敘述者“我”回憶過程之中，敘述曾發生了兩次中斷，兩次都是每當“我”在回憶時碰上了“五”這個符號，心裏就發毛。

我又撞上了“五”了！見“五”就長毛。……現在我只記得鐵門、鐵窗、鐵柵欄。我瞪著眼往裏看，黑糊糊的屋子，往裏看，黑幽幽的廊道，往裏看往裏看，飄飄忽忽的一個白身子，穿著白襯衣，長長的，沒有腰帶，飄著長長的白袖子，撕開了，飄著。長長的黑頭髮，飄著……白襯衣胸前，一個紅紅的大字：“冤”。那是用血寫的，那是血書，那是我姐姐，她有一首詩：《蘸血的幽靈》。那血是鮮紅的，那是剛咬破指頭蘸著寫出來的。那是我姐姐，那是示威，那是蓄謀，那是明知道會見的時候要穿過監獄廊道，那是經過阻攔，經過扭打，撕開了袖子，還是飄飄忽忽從黑幽幽裏飄出來了……那是我姐姐！²²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曾在研究小漢斯的恐“馬”症時，指出恐懼症發生的兩個條件。首先恐懼是與自發性焦慮相關，恐懼症狀的產生是用來避免焦慮的發作，所以恐懼是焦慮的替代物。第二是必須發生一件意外事件，成爲恐懼的對象。²³而自發性焦慮的暴發，往往來自無助的情境。²⁴而“我”每次看見“我姐姐”身陷囹圄的情境，“我”都感到徬徨無助。上述引文正是“我”第一次的探

22 林斤瀾：《五分》，《十年十癮》，頁39。

23 弗洛伊德著，高宣揚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概論》（香港：天地圖書，1987年），頁162。

24 尚柏騰彭大歷斯、尚拉普朗虛合著，沈志中譯：《精神分析辭彙》（臺北：行人出版社，2000年），頁538。

監情況，剛被用刑的“我姐姐”被重重的鐵門、鐵窗、鐵柵欄圍著，而且全身流著鮮血。第二次除了鐵門、鐵窗、鐵柵欄，還有鐵銬鐵鍊，銬著被判死刑的“我姐姐”。正是這些探監情境，不斷地引發“我”的焦慮。害怕失去“我姐姐”的焦慮，來來回回地纏繞著“我”的思緒。

最終，“我”所焦慮的事情發生了。在“我姐姐”處決後的兩天，“我”在街上走著，還碰上了一件突如其來的事——“我媽媽”在前往交子彈費的路上，因心臟病而猝死了。

過兩天，傍晚，我在街上瞎走。叫不出名兒的馬路邊上，踢着雪地上一個倒著的老太太，一看，是我媽媽。凍僵了的拳頭握着，杵在胸口上，她還是犯心肌梗塞了。……我雙手握住媽媽凍僵了的拳頭，拳頭鬆開，手心裏有一個五分的“鋼鏰”。²⁵

這一次意外是“我”恐懼症的爆發點。主人公“我”沒有預料“踢着雪地上一個倒著的老太太”，²⁶竟是“我媽媽”，更沒有預料“我媽媽”會因心臟病而猝死。媽媽突然猝死前交子彈費的五鋼鏰，成為“我”恐懼症的象徵。將“我”十多年來因“我姐姐”而來的焦慮，都刻寫在這個象徵符號身上。這裏用疾病修辭的方法是，將“五”這個象徵符號與回憶結合起來，令回憶的過程變成病發的經過，讓昔日的創傷再次侵擾患者，每當碰到“五”的時候，我便想到“我姐姐”身陷囹圄的畫面。愈是憶起，愈是恐懼；愈是恐懼，愈是浮現。

“五”這個象徵符號還串連起“症狀”與“病因”。“我姐姐”五歲背五言詩，長大後作五言詩，詩作題目又是五個字，最後行刑前的作品是《獻給法官的五朵玫瑰》。在“反右”運動的“禮拜五”，“我姐姐”寫了首《不要跑道上的白線》後，新詩的題目被當作唱反調，而被扣上“思想錯誤”的“右派”帽子。在此可見“五”這個象徵的多元性，又是“我”恐懼的對象，又是“我姐姐”的文藝創作的

²⁵ 林斤瀾：《五分》，《十年十癥》，頁44—45。

²⁶ 同上，頁44。

關鍵字,還有更甚的是它銘刻著一個時代對“我姐姐”文藝創作的打壓。文藝思想是如何被界定為錯誤或正確?背後全由國家的尺度為標準。這種標準變相成為文化審查制度的法則,來剔除不合乎正確思想的文藝作品。文藝作品本身是一種再生產的資源,作品的影響力,不僅是作用於個別的讀者,而是作用於數以千萬計的人心。如此說來,控制文藝作品的思想,是箝制意識形態的必然之舉。“我姐姐”在五十年代被劃成“右派”,到“文革”時新賬舊賬一起清算,最後被警察拘捕行刑處決,無不體現了意識形態國家(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及至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的操作。²⁷那麼每當主人公“我”看見“五”心裏發毛之時,實際上聯繫著對“五”背後那個政治壓抑年代的不安。

“文革”記憶轉化成“瘋癲”,將隨時間而流逝的記憶碎片,轉化成為症狀重返現實,從而使“文革”的瘋狂惡夢永無止境地循環下去。誠然,如孟悅所言,症狀的重複敘述是《十年十癮》重新詮釋“文革”的方法。孟氏指出《五分》通過症狀重複,來延伸和擴大“五”的意義。²⁸從本文上述分析無疑可見“五”的多義性,如果我們都同意“五”具有繁衍現象,那我們更不能忽視“五”這種症狀重複敘述的作用和意義。根據卡露絲(Cathy Caruth)的創傷理論所言,症狀是經歷創傷後遺症的延緩性反應,聯繫著當下創傷事件發生的時刻,所以症狀是創傷記憶和歷史真相的載體。然而,症狀拒絕被困於過去時空,而其擁有一種悖論時間觀:症狀雖然屬於“過去”,但每次的延緩性返回並不僅僅是“回到過去”,而更多的是通過自身的延緩性來衝擊現在以至未來時空,從而令歷史創傷具有跨越時空的效能。²⁹林斤瀾將“文革記憶”轉換成為瘋癲疾病結構,不僅僅是借“症狀”再現“文革”創傷記憶,更多的是通過症狀“病發”來介入現在時空,將事件的創傷效應延伸到當下,進而轉化成批判遺忘的力量。

《五分》的結局是,老同學老朋友為“我姐姐”立了一個“五錯碑”。碑上寫

27 阿爾都塞著,陳越譯:《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收入陳越編:《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334—335。

28 孟悅:《從歷史的拯救到歷史的診斷——林斤瀾論》,收入王曉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第三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頁238—239。

29 Cathy Caruth,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8—9.

道：“一九五〇年錯定為地主家庭，一九五七年錯劃為‘右派’，一九六〇年錯捕入獄。一九六八年錯判無期。一九七〇年錯殺身亡。”³⁰“碑”的空間結構，在此有效地取消時間的限制，幫助“文革”創傷跨越了時空的隔膜。“文革”創傷原是顯現為主人公“我”身上的症狀，症狀本身是一種個人病理反應，有著自然的發病規律。但《五分》最後將“文革”創傷由症狀轉換成一塊“五錯碑”，將“我姐姐”受害經歷與“我”的創傷記憶同時屹立在時間恒河之上，反過來有趣地使“碑”成為了症狀的修辭，疾病還可有痊癒可能，而將症狀刻在碑上如同將創傷永久植入患者體內。這裏暗示“我”將終生墮入恐“五”症的病發循環之中。而且，不獨“我”一人患上恐“五”症，碑屹立在前，在小說中看見的人也會“病發”。在症狀重複敘述之下，“五”的意義不停繁衍，“碑”成為同代人的焦慮和恐懼，進而成為一種召喚創傷記憶抵抗遺忘的力量。最後，小說還通過“碑”來評論“文革”。“五錯碑”上，它記載了五個政治年頭，五件政治運動的前因後果，詞藻之間夾著五個“錯”字。每“錯”都全然否定了所有的政治判決，最後還配上一首由“我姐姐”所作的八言詩歌《歷史將宣告的我無罪》。“五錯碑”在召喚“文革”創傷之同時，亦引導看“碑”者去反思“文革”歷史的是非黑白，令當下的看“碑”者無不感到恐懼，這正是創傷延緩效應的批判力所在。

三、余華《一九八六年》與幻覺

余華和林斤瀾同樣通過寫作為“文革”做十年祭，《一九八六年》借瘋子十多年後的幻覺來穿越時空，令讀者直面十多年前的“文革”暴力。學界亦早已發現小說中“十多年前後”這個閱讀關鍵，王德威指十多年前的革命暴力在受害者自身得到反證，³¹而楊小濱指余華將“文革”語話的創傷感受，以延緩性姿態出現在作品之中。³²如若我們要討論這種十多年前後的時空穿越，實在不能

30 林斤瀾：《五分》，《十年十癥》，頁37。

31 王德威：《傷痕即景，暴力奇觀——余華論》，《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年），頁170—173。

32 文中指作家對“文革”語話的創傷感受，以延緩性姿態出現在先鋒文學之中，當中談及余華《一九八六年》。楊小濱：《歷史與修辭》（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9年），頁42—43。

忽視“症狀”在當中所發揮的作用。

十多年前的經歷引發十多年後的幻覺，這裏的幻覺是拉康所言“精神病”³³的症狀。十多年前身為中學教師的“他”，眼見一些同事被紅衛兵剃陰陽頭，另一些同事在學校中被吊刑吊死，自己實在不願意接受這種“閹割”，所以“他”選擇逃避，“這時他看到了牆上的身影，於是他看到了一個使他得以衝出去的黑洞”。³⁴ 這個黑洞便是“他”逃離“文革”階級鬥爭這個象徵秩序的入口，以表示拒絕參與這場發生在象徵秩序層面的遊戲。這是主體為了逃離被“父親之名”“閹割”所創造的幻覺空間。³⁵ 自足的幻覺世界使“瘋子”感到快樂，卻同時使“瘋子”處於死亡的邊緣，因為被排除的“父親之名”，將會以幻覺方式返回。³⁶ 在小說中的紅衛兵具有“父親之名”的象徵作用，他們在“文革”語話之下，擁有執法者的權威。“瘋子”在“文革”十多年後於昔日的小鎮裏，用菜刀、鋼鋸、砍刀自虐之時，實際上是幻覺中紅衛兵形象的返回。在劊刑進行時，清楚可見瘋子一人分飾兩角：執法者與受法者。受法者是瘋子的肉身，執法者則是瘋子幻覺中的紅衛兵形象。那“嘴裏大喊一聲：‘劊！’”³⁷的正法號令，“鋸齒對準鼻子”³⁸的鐵面姿態，及至每擺動一下都配合大喊一聲“劊！”的懾人氣魄，順著瘋子的肢體擺動，漸漸呈現出一位冷酷無情的執法者的權威形象。如此說來，幻覺將十多年前“文革”紅衛兵施刑的暴力場景，於“文革”十多年後重新示現。幻覺症狀如同牢籠，全然將“瘋子”囚禁。幻覺世界本來是“瘋子”的避難所，可是避難所最終卻變成地獄。這裏的修辭效果與《五分》象徵繁衍有所不同，這裏著重的是視覺性，歷史時空仿如影畫播放，進而帶領我們重返歷史現場。

許子東分析《一九八六年》的“病因”時指出，迫害者是“無名”，即是“災難

33 拉康指出，“精神病”患者排除“父親之名”後，“父親之名”將會以幻覺的方式返回。福原泰平著，王小峰、李濯凡譯：《拉康：鏡像階段》（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04—205。

34 余華：《一九八六年》，《現實一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頁124—125。

35 福原泰平著，王小峰、李濯凡譯：《拉康：鏡像階段》，頁205。

36 同上，頁204—205。

37 余華：《一九八六年》，《現實一種》，頁143。

38 同上。

來臨卻不見具體肇事者”。³⁹ 許氏此言是相對於其他“文革”小說而言，例如屬於“災難故事”的《芙蓉鎮》和《大牆樹下的紅玉蘭》等小說都有明顯的反派角色。⁴⁰ 故此，這些實驗性“文革”小說（包括林斤瀾《十年十癥》）沒有具體反派角色便成為其特點。換句話說，這些小說所著重的不是“災難故事”中“好人——壞人”二元對立的迫害關係，即迫害是可以隨著“壞人”消除而不見，《一九八六年》中的迫害是無法消除的，而且是如鬼魂般無處不在，因為這種“迫害”是心理性。“他”還未病發時，曾被紅衛兵帶到學校的教員室，看見窗戶玻璃仍明亮如昔，在伸手撫摸之際，卻發現窗框早已空空如也，只剩下了一塊倖存的玻璃。“他”的命運如同這塊“倖存的玻璃”，其他同事已被掛掃帚剃陰陽頭，被執行私刑，看見同事的屍體時，“他彷彿聽到那人影（按：屍體）低聲嘟囔了一句——‘是你’”。⁴¹ 當“他”聽見一句“是你”的時候，“他”被詢喚（interpellation）成為“教師”，⁴² 而“教師”在“文革”時被視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他”曾經看見同事被紅衛兵毒打，觸發“他”看見同事屍體（批鬥結果）時內心說了一句“是你”。這種自我投射，反映了“他”已經被這種意識形態的邏輯所捕獲。《十年十癥》中的迫害者同樣是“無名”。小說中的“迫害者”是當時文藝意識形態，“我姐姐”有關“五”作品被視為政治不正確，“五”借代著那個時代思想禁區，主人公一見到“五”便反射式的對號入座，“血管緊張，胃痙攣，心慌，頭暈，眼花”。⁴³ 如此說來，所謂“迫害者”，實際上便是意識形態的幽靈，這個無影無形卻又無處不在的幽靈，年年月月纏繞著受害者，在他的心頭盤桓不去。沒有具體迫害者，反而更突顯“病因”的心理效果——本能式自我迫害（《五分》），以及妄想性迫害（《一九八六年》）。作家巧妙地選取瘋癲這種心理疾病，讓我們從心理角度剖開了小說中的政治文本，窺見了身體與國體之

39 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頁 240。

40 同上，頁 212—214；239—241。

41 余華：《一九八六年》，《現實一種》，頁 123。

42 在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識形態理論之中，提出意識形態詢喚作為主體的個人（Ideology Interpellates Individuals as Subjects），這種詢喚是通過主體經歷的物質儀式實踐來發揮作用。張一兵：《問題式、症候閱讀與意識形態：關於阿爾都塞的一種文本學解讀》（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年），頁 179—182。

43 林斤瀾：《五分》，《十年十癥》，頁 44—45。

間令人心寒的關聯，從而呼喚著一個時代的精神狀態的“不正常”。

這種“迫害”是通過症狀病發來反覆現身。上文指出，“病發”其實是創傷延緩性的表現，臺灣學者李秀娟在卡露絲創傷理論的基礎之上，提出以“歷史創傷”作為敘述歷史方式，強調“歷史創傷”不是挖掘史實來編織線性敘述時間的歷史事件，而是藉創傷延緩性開啓歷史再敘述的過程，創傷具有一種游走於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能動性(mobility)，從而引申出一種多元時間觀的敘述方法。⁴⁴ 學界歷來分析《一九八六年》的敘述“文革”方法，著重以歷史事件角度為切入點，指出小說將“文革”的過程省略，敘述時間沒有按照“文革”歷史事件以編年方式排列出來，“文革”從而被理解成為一件不可解釋的“荒誕事件”。⁴⁵ 若以本文所關注的“歷史創傷”角度切入，《一九八六年》中敘述時間是故意顛倒“文革”的歷史時間。《一九八六年》中幻覺症狀成為穿越今昔的隧道。通過瘋癲的病發——紅衛兵形象復返，來批鬥十多年後的“瘋子”。這樣諷刺地道出“瘋子”逃得過十多年前“文革”的迫害，卻逃不過“文革”十多年後的一劫。在細讀時，我們發現“瘋子”死亡的場景——“躺在一個郵筒旁，滿身的血迹看去像是染過一樣”，⁴⁶ 曾發生在十多年前“文革”之時，“他”還親眼看見過。“他看到一個人躺在街旁郵筒前，已經死了。”⁴⁷ 同樣，十多年後的“他”亦難以獨善其身。“躺在郵筒前死亡”的場面，十多年前是他人，十多年後竟是“他”自己。除此之外，本文還想指出創傷時間性的作用，“瘋子”返回十多年後小鎮的時候，與小鎮時空對話的情況。

余華將十多年前的場景重現在今天的小鎮，企圖召喚早已被小鎮居民忘卻的創傷記憶。十多年後的小鎮，現在是春光明媚，春雪崩潰，到處生機勃勃。余華將春天隱喻發揮到淋漓極致，希望、生機、樂觀與光明這些春天予人的印象全然體現在小鎮居民生活的姿態當中，年輕人抽煙談戀愛；老年人飲茶看電

44 在卡露絲創傷理論的基礎之上，李秀娟精闢地指出歷史創傷具有一種多元時間觀，並主張將日裔美國遷徙營歷史視為一種歷史創傷，而非歷史事件。李秀娟：《歷史記憶與創傷時間：敘述日裔美國遷徙營》，《中外文學》，2012年第41卷第1期，頁25。

45 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頁233—236。

46 余華：《一九八六年》，《現實一種》，頁165。

47 同上，頁121。

視。這些情況與“瘋子”一癩一拐地走進小鎮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對小鎮的居民來說，有瘋子“躺在郵筒前死亡”，只不過是陽光燦爛下的一攤血。

瘋子已經死了，躺在一個郵筒旁，滿身的血蹟看去像是染過一樣。有幾個人正罵罵咧咧地把他抬起來，扔到一輛板車上。另一個罵罵咧咧提著一桶水走來，往那一攤血蹟上一沖，然後用掃帚胡亂地掃幾下便走了。板車推走了，圍著的人群也散了開去。於是她們繼續走路。她在看到瘋子被扔進板車時，驀然在心裏感到一陣輕鬆。⁴⁸

對瘋子來說，“文革”創傷如同他身上的血蹟，濃稠而化不開，但對於小鎮居民來說，血蹟用水一沖便了，更甚是瘋子一次又一次的發瘋用刑，旁人及其妻女竟視若無睹。若果由瘋子病發到死亡，是以症狀召回過去的記憶返回來侵擾當下，迫令遺忘者來反思問題，我們卻嚇然地發現，小鎮居民竟將記憶遺忘，將創傷刪除，仍舊在明媚陽光裏走著。《一九八六年》“躺在郵筒前死亡”的場面以及《五分》的“碑”同樣體現創傷時間的能動性，以“症狀”來敘述“文革”，擺脫了一種按照線性時間觀來講述“文革”的方法，將“過去”與“現在”並置在同一時空，去延伸“文革”創傷的渲染力，使“文革”創傷陷入無止境的“病發”循環之中。

四、結 論

林斤瀾談及《十年十癥》的寫作原因，“十年‘文革’過去十年，……據說，寫‘文革’的東西儘管還沒有寫夠，更沒有‘無愧碑’……我想寫幾篇‘憶’，寫下來卻是‘癥’”。⁴⁹ 文中道出，踏入八十年代中期，講述“文革”的潮流退卻，而這種退潮某程度上為書寫“文革”故事提供了更大的敘述空間。在《五分》及《一

48 余華：《一九八六年》，《現實一種》，頁165。

49 林斤瀾：《說癥（前言）》，《十年十癥》，頁1—2。

九八六年》的“文革”故事都是圍繞一個瘋子患病的經歷來開展，“文革”是瘋子創傷經歷，並顯現為身體症狀。在這裏“文革”不再是服務大敘述的國族寓言，而是一篇個人病歷。

“文革”記憶編寫成一篇病歷，意味著“文革”敘述進入了疾病敘述的結構。本文正是討論“瘋癲”與“文革”這兩種話語的轉換關係，在“瘋癲”框架之下，我們會發現作家將“文革”敘述瘋狂化。“瘋癲”在這兩篇文革小說中，體現為“症狀”、“病因”以及“病發”。兩篇“病歷”有不同類型症狀——恐懼和幻覺，“症狀”取消“記憶”時間性，作家將“記憶”轉化為“症狀”，強調了“文革”意識形態的幽靈為人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心理陰影。林斤瀾《五分》談恐“五”症，借符號“五”作為象徵，而“五”的象徵意義不停繁衍到其他事物身上，最終恐懼永無止境地如病菌般蔓延開去。如果《五分》是通過“五”象徵的繁衍，導致恐懼隨處附身的話，《一九八六年》則是通過幻覺將“文革”場景重現，批鬥暴力無不令人驚心動魄。這種以“症狀”處理“文革”記憶的方式，不僅強調“文革”遺留的心理創傷，更為重要的是創造了一種有別於“傷痕文學”的敘述“文革”的方法。“症狀”將“文革”這件歷史事件轉化為歷史創傷，每次症狀的病發，不僅僅是回到受害發生時間原點，而是將過去創傷記憶碎片延展到當下，使自身成為激活創傷記憶的力量。這種力量體現在這兩篇小說中分別是，1986年死亡場景重新示現，以及昔日受害經歷化為今天碑墓。“碑墓”和“場景”這些空間修辭，一方面如前所說有效地取消“記憶”的時間性，另一方面由“病發”所引申的多元時間觀，對抗著“傷痕文學”以線性敘述來解脫苦難的敘述特點，從而令我們活在“文革”創傷與瘋癲病發的循環之中來反思歷史。

(作者：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引用書目

一、中文

(一) 專書

- 王斑：《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香港：牛津出版社，2004年。
- 王德威：《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年。
- 王曉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第三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
- 弗洛伊德著，高宣揚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概論》。香港：天地圖書，1987年。
- 余華：《現實一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
- 谷聲應、陳利民編：《中國新時期文學精品大系》。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年。
- 阿爾斯塞著，陳越譯：《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林斤瀾：《十年十癩》。北京：中國華僑，1996年。
- 拉康著，褚孝泉譯：《拉康選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
- 尚柏騰、彭大歷斯、尚拉普朗虛合著，沈志中譯：《精神分析辭彙》。臺北：行人出版社，2000年。
-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2000年。
- 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
- 陳國凱：《陳國凱小說選》。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
- 陳曉明：《剩餘的想像：九十年代的文學敘事與文化危機》。北京：華藝出版社，1997年。
- 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
- 張一兵：《問題式、症候閱讀與意識形態：關於阿爾都塞的一種文本學解讀》。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
- 楊小濱：《歷史與修辭》。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9年。
- 楊小濱著，愚人譯：《中國後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創傷與反諷》。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
- 福原太平著，王小峰、李濯凡譯：《拉康：鏡像階段》。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 #### (二) 論文
- 李秀娟：《歷史記憶與創傷時間：敘述日裔美國遷徙營》，《中外文學》，第41卷第1期（2012年

3月),頁7—43。

李敏:《“傷痕”與“反思”文學中的創傷敘事研究》。山東:山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

許子東:《新時期的三種文學》,《文學評論》,第2期(1987年),頁64—78。

張法:《傷痕文學:興起、演進、解構及其意義》,《江漢論壇》,第9期(1998年),頁58—62。

程光焯:《“傷痕文學”的歷史局限性》,《文藝研究》,第1期(2005年),頁18—23。

二、外文

Caruth, Cathy,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Leys, Ruth. *Trauma: A Genea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Trauma, Mem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llness as a Literary Device: On the Writing of Madness in Lin Jinlan’s “Five Dollar Coin” in *Ten Cases of Hysteria in Ten Years* and Yu Hua’s “The Year 1986”

Leung Shuk Man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wo novels from the mid – 1980s, Lin Jinlan’s “Five Dollar Coin” in *Ten Cases of Hysteria in Ten Years* and Yu Hua’s “The Year 1986.” It uses madness as a literary device to interpret the traumatic mem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irstly, by employing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ies of Jacques Lacan and oth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traumatic mem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e disguised as symptoms of madness, in which different symptoms contain their own features as a literary device. While Lin Jinlan employs “five” as a symbol to represen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traumatic memories, Yu Hua reproduces the atmosphere of denunciation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rough delusional madness. Secondly, this paper shows the causes of the symptoms, which are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s of two madmen. The paper also illustrates the individual symptoms that are linked to the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sett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order to reveal the disorder and absurdity of that period of time. Finall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herent belatedness of the symptoms of madness using Cathy Caruth’s idea of trauma,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madness writing in terms of the narrativ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eywords: Lin Jinlan's *Ten Cases of Hysteria in Ten Years*, Yu Hua's "The Year 1986", madness, illness as a literary device, traumatic mem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